

ZhongGuo JINGJI ZhuanGui

JINGJI ZHUANGUI
DE
GUOCHENG YU
XIAOLU
WENTI

经济转轨的 过程与效率 问题

吕 炜◎著

时空

——两类经济体、三种体制：对当今世界经济体制存在形态的不同侧面的观察与思考。

政策

——打破“贫困恶性循环论”推动新一轮机制创新：从“财政退让/金融跟进”到“财政进取/金融配合”的政策之变。

案例

——中国经济转轨中的资本化运动的原理与作用机理之实证和具体分析。



经济科学出版社

经济转轨的过程与效率问题

吕 炜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殿和

责任校对：王苗苗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董永亭

经济转轨的过程与效率问题

吕 炜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涿州市星河印刷厂印刷

涿州市星河装订厂装订

880 × 1230 32 开 7 印张 190000 字

2002 年 5 月第一版 2002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7 - 5058 - 3007 - 4/F·2375 定价：2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转轨的过程与效率问题/吕伟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5

ISBN 7-5058-3007-4

I. 经… II. 吕… III. 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IV. 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0251 号

目 录

论题缘起（自序）	（1）
----------------	-----

时 空 篇

转轨经济学的几个猜想	（16）
转轨经济的时空分析与中位观察法的研究	（28）
资本能量构成与资本的国际竞争力差异研究	
——解释国家之间体制博弈的实质	（65）

政 策 篇

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章程”改变的机制创新意义	（96）
中国改革进程中财政政策取向为何会发生两度转折之变	（115）

案 例 篇

中国经济转轨的内在动力研究	
——以资本化运动为线索的解释	(157)
体制转轨过程中流通环节从缺损到修补的研究	
——资本化运动的一个案例分析	(175)

附 篇

以转轨经济为研究对象的若干共同性课题	(192)
后记	(211)

论题缘起

(自序)

这些年来，我的那些只能算得上是学习经济学笔记的所谓论文，发表的大约有 100 多篇了，经过岁月淘汰，剩下来还有些价值可言的已经不多。挑来拣去能够聊以自慰的，竟是当初不经意中跳出学术研究某些固定范式、全凭实践感悟随意挥洒的那几篇。它们虽然幼稚与粗陋痕迹毕现，反而自成一体，显出几分不甘泯灭的生气，这就有了保存的意义。于是几篇文章的无意穿插赚得了一部专著。蒙经济科学出版社厚爱得以出版之际，本应郑重请人作序加以拔升，碍于以上所说幼稚、粗陋等原因，也就有些羞于出口了，只好自己勉强为之。因此，这样的自序也就不好再套用什么范式，只能实话实说，觉得怎样更容易表达，就怎样一路随随便便地写下来。

—

本书书名提示的主线，是试图探究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和效率这两大问题。这也就意味着，以下的话需要先分别说一说，然后再合起来加以归纳，阐述二者之间的关系。

“转轨”一词应用于经济学始于何时、最初是何意？老实说，我没有考证过，因而难言其详。我最初学习做经济学论文时曾经有过一个误会，以为做论文就一定得有个“做文章”的架势，概念用别人少用过的为好，语言离生活越远、越抽象便越能显示出学术品味。一次偶然机会，一位对经济学颇有兴致但并非科班出身的朋友

的一句问话，方让我如大梦初醒：“看不见的手”的说法不生动吗？“守夜人”不就是打更的吗？从此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并非一说到抽象和概括，其表述就一定是套用书面语言这样一种模式，书面语言最初也是从生活语言而来，有些生活语言使用得恰当了，反而别具一种抽象和概括的特殊魅力。

我对“转轨”一词的最初体悟，始自于在一个大型的列车编组站的观察：一列长长的车厢“轰隆隆”朝着编组站开过来，经过重新编组后又“轰隆隆”而去。因为开进来的每一长列车厢，都是从不同始发站开出来的“旧列”，各个车厢运送货物的终点站并不一样，便需要在铁路网的枢纽城市设置大型编组站进行重新编组，使它们各自归并到相同终点站或相同方向的“新列”中去。随着扳道叉的有序开启与关闭，发往不同方向的车厢一边脱离原有轨道，一边井然有序地转接到新的运行轨道上。那一瞬间，我就由眼前编组站的“转轨”，联想到了体制改革进程中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过程。我觉得，二者之间至少存在着两个相似点：其一，都是在完成逐步脱离原来那一条轨道，而逐步转接到另一条轨道的“转轨过程”；其二，都不是以静止状态，而是在运动中、以相互间的协调有序为前提，去完成这样一个“转轨过程”。基于此，我的“转轨过程观”考察的出发点，在侧重上可能与别人有些不同。

简单地说，第一，我强调它是一个体制去置换另一个体制的过程，即新体制进入的主动性；第二，我强调这样一个置换过程是在运动中完成的，动态观察比静态分析更为重要；第三，我更愿意将这样一个动态的置换过程放到类似“编组站”的框架内进行观察，即从“中间”往“起始点”和“到达点”看，而不太倾向于始终站在最早那个起点看问题，始终局限于只分析从起点到现在、只比较起点特征与现时特征的方法。

然而，要找到这样一个“编组站”的“观察窗口”，并不那么容易。

我清楚记得，在我上大学一年级时，不只中国经济学界而是整个理论界，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中国体制改革究竟是否有明确目标

和正规理论遵循的争论。有人认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是有的，但我们中国没有，应该像他们那样遵照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来加以校正，或者干脆请他们来帮助我们搞一个完整和规范的总体改革方案。有人认为我们有理论，“白猫黑猫逮住耗子就是好猫”之“猫论”就是讲的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之“摸论”就是实践论。在这次争论之后的不久，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一场大动荡，并且以“学潮”形式，把宁静的大学校园卷了进去。

“学潮”结束后，我曾搜索过距离这段时间最近的决策层关于中国改革“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定位”，那是中共十三大提出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①。再往前追述，则是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做出的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明确主题的第一份正式决定，那时的目标定位起点更低，只是提出了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指出“改革现行的计划体制，就要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②。更往前追述，在发动体制改革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关于这场改革的终点站在哪里，需要进行多长时间可以基本结束，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就更不可能做出清晰的界定了。

但是我发现，有一个中心线索却从开始就有，并一以贯之地继承下来。关于这一点，在为这次历史性会议确定大方向的另一次重要会议上，邓小平讲得非常肯定。他指出，中国领导层需要在思考中国经济问题的立足点上有一个彻底转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有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报告。

② 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①。今天，我们从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回过头去重温邓小平同志这段话，便可以很深刻地看到，将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作为进行这场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它作为中国政府在决定中国这场体制改革“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方向时，一直存在着并起着坐标定位的作用。

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一部专著中，曾经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源”与“流”的问题，进行过一番考察。我认为，从更宏观的视野看，“从何处来”即从怀疑和抛弃斯大林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来；“到何处去”则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探索 and 不断继承创新的过程。我这样写道：三代领导人针对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经济学思想革命的向前发展线索是十分清晰的，这便是由“毛泽东时代”对所有制和分配方式过急变革一段、又向后调整一段的矛盾性决策及实施，发展为“邓小平时代”提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其他经济为补充的所有制结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的分配结构模式，再发展到“江泽民时代”进一步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基础，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鼓励”；“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制度”；“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等界定清晰、便于操作的制度化完备体系^②。

那么，在市场化取向逐渐清晰以后，有没有人在“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之间，对这一转轨过程进行过更具体一些的阐述呢？

^① 邓小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3页。

^②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比如说，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究竟到什么时候可以大体完成？要做出这样的预见，显然是更加不容易的。一是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数百年才逐步形成一套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要进行这样长的时间区间的预测，难度实在太大了。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化过程，是沿着古典市场经济（自然发育商品经济生产关系）→发达的商品经济→现代市场经济，这样一条递进的线索顺向“生长”而成的；我们则是在一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二要在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三要以保持社会稳定为前提，四要在“计划体制→市场体制”矛盾冲突过程中，去完成新体制对旧体制的置换，毫无外界参照怎么可能做出准确判断来呢？

但我惊喜地发现，邓小平在他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已经间接地回答了我所关心的问题。他这样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①。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是1992年，以他的预言来推测，中国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总过程，即市场作为配置经济资源的基础方式所依存的经济制度的成熟和定型，从现在算起大约还需要20年的时间。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成熟过程中几百年时间所完成任务，我们在1978~2022年这一个大体的时段内，总计只有四五十余年时间里，就可以基本上走完这一段路程。

二

从理论界看，关于“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关注，如果我的关注视野没有重大遗漏的话，20世纪90年代前后围绕着“过渡经济”和“过渡经济学”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可以将其视为发端。

^①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1、37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以盛洪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显然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①。

形成那一次小小热潮的原因，我以为，是两方面的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一，中国改革已经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绩，但也面临不少困惑，传统的政治经济学难以进行恰当解释，产生了向外借用新的分析框架的内在动因；其二，一批留学生回国，将现代西方经济学比较系统地介绍到国内来，给人们剖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何去何从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观察方法和思考角度。

仔细翻阅当时的文献会发现，在那次试图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何去何从进行解析的讨论中，主要侧重在借鉴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体系，来评判中国已经进行了十多年的改革绩效和不足。一些学者着眼于介绍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出中国的改革应该怎样做才是合理的；另一些学者着眼于捍卫中国改革成功的局部合理性，致力于从西方经济学原理中寻找和发掘可以证明自己所建立论点的依据。就当时历史条件而言，都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良好开端，或许在已取得成果基础上继续走下去，并且有一个权威机构将研究力量优化配置一下，逐步把注意力转到对“计划”→“市场”之“转轨总过程”的基础性研究（而不是侧重立即指导当前政策制定的应用性研究），或许我们今天就不只是对1978年以来的情况了如指掌，还可能对二三十年后才能最终到达的“终点站”之间的若干问题，也大致说得清楚了。

遗憾的是，小小热潮之后，人们的热情渐渐冷却下来。即使有人继续在做着相似的努力，但从那以后的文献积累来看，那一批颇有才华和报国热情的年轻人，以及他们的崇拜者，后来或者转向了经济学的应用研究领域，或者渐渐地陷入了局部、细微、技巧方面的研究。在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上，针对着中国体制改革中的某个具体问题怎样与西方理论相互证明的论述者较多，像当年那样从总体上关注中国体制改革如何到达“终点站”，以“现在时”为起点往前探讨的热情，似乎就一直未再出现当年那样的小小热潮。

^① 参见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或许是因为个人经历和思维方式偏爱的缘故所致，我对 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细节性变化兴趣不大，而对转轨总的过程和过程中经济的特征激赏不已。尤其是当这场大变革使中国经济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崭露头角时，我总是情不自禁地在内心涌动着一股“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冲动。

我以为，1978 年所提出的“体制改革”，在当时以及其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主要还只是一个“布置工作”层次的概念，随着实践和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被执政党及其政府吸纳，才逐步提升为目标日益明确的“从何处开始”→“到何处结束”的系统构想。它的本源来自于本土，它的成长力量却揽括了八面来风的助力和阻力、激励与撞击，始终未离自己的根系。中国的体制改革超越“布置工作”层次而上升到系统有序地、科学规范地组织运作的标志，从理论确定和国策确定上判断，应该从中共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终极目标之日算起。也就是说，将中国体制改革作为“计划”→“计划 > 市场”→“市场 > 计划”→“市场”这样一个经济转轨总过程，来加以考察和深入研究的客观准绳，从那时候起就已经有了。

纵观中国近 20 余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具有标志点意义的事物肯定不会只有一个或两个。因为这 20 余年来由改革开放所引起的、发生在中国人民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实在太多。但是在我看来，如果将这个标志点的含义明确为从“计划”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总过程中发生了重大转折意义的某一时点，一个可能的选择时点将会是 1998 年。这一年的上半年，国家商品信息中心首次宣布其监测的 601 种主要商品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处于供大于求和供求平衡状态，此后数年的宏观经济运行并未偏离这种状态，这就最终表明中国政府确实已经成功地取得了“反短缺”的胜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确实已经越过了从“计划”到“市场”运行“轨道转接”之变的“转折点”。

明确这一点的意义在于，在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终极目标为我们确定了进行转轨的过程问题研究的准绳之

后，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率先取得了“反短缺”胜利，使我们考察转轨总过程的立足点发生了质的变化。即：过去我们只能以改革的发动起点为立足点来认识该过程，而此时我们可以以这个不可逆的转折点为立足点，以实践材料作“垫脚石”，既可回顾、更可前瞻地考察转轨的总过程了。

另外一点值得重视的是，当越来越多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走上从“计划”到“市场”的体制改革道路，并且经过所谓“休克疗法”、“大爆炸”之类试验之后，人们逐渐清醒了。“计划”→“市场”的转轨不仅可以有实现路径的区别，而且搞市场经济也并非一定就要与资本主义同义，非意识形态方面共同的转轨规律也是客观存在的。即：所有面临着“计划”→“市场”转轨任务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都会遇上若干相同或相似的难题，会有相似的必经之路要走，同时又都存在着尽量减少一些成本支付、少走一些弯路的愿望，彼此的交流和合作正在日益增多。据有的学者估计，目前已有 35 个国家、占世界 1/4 的人口，被卷入了这场转轨变革中^①。这意味着，在上述两个有利条件之外，我们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转轨过程的研究，现今还多了一个横向比较的参照系。同时，如果我们有兴趣并有志于在世界范围内针对转轨经济进行总体研究，还可以将整个转轨国家的转轨总过程作为一个转轨经济的总体，像研究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那样，去安排和展开更为综合与更为专门化、系统化的研究。

三

转轨效率问题的提出，首先是基于 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连续 20 多年来的近 10% 的年均增长率，这在所有转轨国家中是罕见的，在当今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情况下更是一枝独秀。中国是

^① 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0 年版。

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或许可以称之为又一经济学之谜。

概括起来讲，我对此的研究，是沿着三条线索展开的。第一条线索是，尊重转轨经济的非均衡系统运动特征，政府应对得当；第二条线索是，从调整分配关系增加居民收入启动最终消费入手，打破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第三条线索是，事实上承认了在资本剥削剩余劳动负面效应之外还存在着基本是中性的另一面，即发挥资本技术范畴内的功能使社会再生产持续性地维系着较为充足的激励因素。

别人怎么定义转轨经济，我研究过，但我还是不很习惯于通行的定义方式。我从经济生活的实际观察和亲身体验出发认为，充分认识并重视它的阶段性经济形态特征，乃第一要义。直白地说，它是处在“计划”→“市场”体制变动过程中，并且只属于这一时间段落而存在的段落性质的经济，或者称“过程形态的经济”。

过程是什么呢？最一般的表述，应该是指事物状态的变化在时间上的持续和空间上的延伸。与“过程”相对应的概念是“状态”，状态是对事物特性的量度和描述。过程和状态普遍存在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中，二者既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又相互制约。所谓转轨经济的总过程，其基本含义是指一国经济资源基础配置方式从计划机制到市场机制变化的状态，在时间上持续、空间上延伸的系统集合。

这样一个“变化的状态在时间上持续、空间上延伸的系统集合”中的转轨经济，它的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呢？我认为是普遍的非均衡性系统运动特征。从区别于稳定形态的经济来说，它是一个过渡过程中的未定型、只在转轨途中存在的经济形态；从宏观调控经济运行的客体来说，它是一个双重机制同时存在并随时互相博弈，负载着特殊变量运行的经济；从微观经济层面考察，它的经济基本单元的整合与重构，由于受到转轨政策调控和宏观政策调控或者相互促进，或者相互抵消的影响，往往表现出非常规性和变异性的特征等等。

尊重转轨经济的非均衡运动特征，举最初的实例而言，邓小平

在体制改革一开始就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本身就体现着承认转轨过程展开后必然会加速经济体非均衡系统运动的足够估计。众所周知，在改革前，地区之间、企业之间、家庭之间、个人之间的这种差距是很小的，当时大家都处于几乎完全均等条件下的公平，也大体上是共同处在缺吃少穿水平上的公平。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九五”初期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上海市，最低的是甘肃省，后者的收入水平只及前者的41%；到“九五”末期该项指标最高的仍为上海市，最低的为山西省，后者的收入水平只及前者的40.3%。这里首先看到是明显的地区性差距的形成，并且5年间还扩大了0.7个百分点，但更为重要的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上了一个大台阶。“九五”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95年的57495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89404亿元，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率为8.3%，大大高于同期3.8%的世界平均增长率。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明显增大，其GDP比重由1995年占世界的2.1%，增加到2000年占世界的2.4%。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相关资料，1999年中国GDP居世界第七位，排名在中国前面的六个国家中，中国除与美国、日本差距在4倍以上外，分别相当于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47%、69%、73%和86%；到2000年末中国和意大利的GDP规模已大体一致。

关于第二条线索，即从调整分配关系增加居民收入启动最终消费入手，打破了贫困的恶性循环，我以为这一问题可由改革的艰难启动的例子说明。1978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动初期，政府一方面既对作为生产单位与消费单位合一的农村居民家庭提高农产品销售价格，同时又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供应价格；另一方面既对城镇居民实行农副产品价格补贴，同时又对工业企业放权让利，为此国家财政承担了多年赤字的巨大压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政府在做出这样的决策时，财力不仅说不上是宽松的，而且是“十年文革动乱”结束不久，国民经济刚刚在崩溃边缘勒住缰绳，紧接着又因一场“洋冒进”再度失调的背景下，以超凡胆略和智慧做出的惊人

之举。中国的体制改革“瓶颈”与经济增长“瓶颈”，恰好就是从调整分配关系、启动最终消费取得突破的。

关于第三条线索，即事实上承认了资本剥削剩余劳动负面效应之外还存在基本是中性的另一面，发挥资本技术范畴内的功能使社会再生产持续性地维系着较为充足的激励因素。这是一个并不像前面两条线索那样容易说清的问题，我为此写了一部 30 余万字的专著《资本挑战体制/关于中国经济转轨原理的一种解析》^①。我的基本看法是，资本不仅具有与资本主义一起来到人间的时代背景，而且同时具有与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达阶段相契合的时代背景；如果将资本的阶级属性划分为历史范畴，那么资本的功能属性则可划为技术范畴；指出或抹煞历史范畴资本的阶级属性，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而对技术范畴资本从实行压抑政策转变为实行激活的政策，则可视为旧体制向新体制的分界线。“计划”→“市场”的转轨过程，必然内含着一个适度容忍历史范畴资本的痕迹存留而充分发挥技术范畴资本功能的过程。中共十五大正式明确了“资本”与“技术”并列的作为生产要素合法存在的价值和地位，这意味着政府以市场为载体推动资本化运动来取得经济增长动力的方向更加明确了。

四

转轨过程与转轨效率的研究，事实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效率的考察必须置于过程分析中，过程的观察离不开效率的反馈来检验和回应。

本书中收集文章 8 篇，除“附篇”《以转轨经济为研究对象的若干共同性课题》是我针对这一领域研究现状发表若干个人不成熟见解外，其他 7 篇文章按“时空篇”、“政策篇”、“案例篇”分别列为三个专题。

^①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